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

——与刘继增等同志商榷

张光宇

关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它是“公开的取消主义。”^①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它是“投降式的让步。”^②对此早已作过结论。但是，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三同志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一文^③（以下简称刘文）中却对此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认为它是“必要的妥协，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投降主义，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对革命的背叛”。那么，交枪事件究竟是“投降式的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呢？本文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向刘继增等同志及党史学界的同志们求教，不妥之处，请指正。

—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我认为，要正确判断交枪事件的性质，首先必须弄清交枪的真实情况。

根据蔡和森同志回忆，六月二十八日清晨，“独秀召集在西门子鲍宅开紧急会议，立三、兆征因劳动大会缺席，秋白亦未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解散总工会纠察队将缴州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行希望C. P. 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部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④又据张国焘回忆：“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⑤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的决定是错误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同时，交枪的实际结果又比这个决定走得更远，不仅公开解散了纠察队，而且又未能实际编入张军，是彻底地缴械了。

刘文认为交枪事件是“必要的妥协”的主要根据是：当时处理工人纠察队及其枪支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准备抵抗”，二是“拖走队伍”，这两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三是“自动缴

械”，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谓自动缴械，就是‘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自动交出一些枪支，以麻痹敌人，而让纠察队员三三两两过江，‘实际编入张军’。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又可以使我党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时间，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抗”。这种做法，说明“当时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是按照他原来把工人纠察队调过武昌加入叶贺部队的设想来执行中央关于交枪决定的”。究竟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下面我仅就三个问题作些考察。

首先，应该怎样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刘文在论述处理纠察队及其枪支的三条道路问题时，把当时武汉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只看到不利的方面，未看到有利的方面，因而，甚至认为“拖走队伍”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刘文说：“当何键、李品仙等已摆开架势，正准备寻衅开刀时，纠察队如果整队携械过江，显然是要受到何键部队的袭击和围歼的。这样做，正是何键所希望的。所以，这条路事实上是走不通的。”我认为，如果对当时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作一全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纠察队采取多种形式实现过江（不一定“整队携械过江”）的任务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就不利条件来看：第一，汉口的反动军队比较多，第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唐生智任总指挥）的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大部分驻扎在汉口一带，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已公开反共。就汉口方面的军事力量看，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是非常悬殊的。第二，党中央已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统治，已无法应付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第三，汉口和武昌因长江天险，交通不便。由于存在这些不利条件，纠察队要实现过江的任务，是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但是，就有利条件来说：第一，在武昌方面，尚有比较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当时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张发奎所部内共九团”，“湖北警卫团一团”，“政治军事学校约一团”，“农民训练所学生约五百人，有枪”。⑥“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⑦其中卫戍武昌的叶挺二十四师曾在反击夏斗寅叛变战役中再一次显示了英勇善战的威力。既然过去当夏斗寅独立十四师进犯武汉时，主要依靠叶挺二十四师的力量，迅速地击退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现在如果何键要动武的话，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六月底，为追歼夏斗寅残部，叶挺率二十四师的七十团、七十二团和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暂时离开了武昌，开到了鄂城一带。但这时，夏逆已被赶出了鄂境，追歼任务已经完成，如果武汉形势紧急，立即将叶部从距武昌不远的鄂城调回来，是完全可以的。驻扎在广济武穴一带的我党直接影响下的贺龙暂编二十军，同样可以调回武昌来援助的。同时，我党直接掌握的武汉周围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也是完全可以调来支援的。第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四军，第十一军驻扎在武昌，张部曾有“铁军”之称，无论在第一次北伐，还是第二次北伐中，都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第二次北伐中，虽部队损失较大，但已开始得到补充。当时张发奎还尚未公开反共，因他考虑到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害怕公开反共，“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⑧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意纠察队编入他的军队，党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也已经与他交涉好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何键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张发奎是不会置之不理的。只要他的态度强硬，何键是不会没有顾忌的。后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张部的军官教导团一事便是例证。七月中旬，军校学生在武昌洪山打野外，何键、李品仙乘机将洪山包围起来，企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力量。而这时张发奎与何键为争夺武汉政权和两湖地盘早已互不相容。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便利用张、何之间的矛盾，建议张把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张从扩充自己的势力的目的出发，便向何

键、李品仙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撤退了包围部队，军校随即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⑩这已经是七月中旬发生的事了，难道在六月底我们还不能更有效地利用张发奎与何键之间的矛盾，给何键施加压力吗？第三，当时汪精卫、谭延闿对待纠察队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至少表面上还装着并未赞成解散纠察队的样子。在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当詹大悲讲到湖北总工会“昨天自动的将纠察队解散，将枪枝都送交卫戍司令部”问题时，谭延闿说：“中央并没有要他们缴械”。汪精卫也说：“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当詹大悲说到“除此以外，已经有两三处工会被捣毁了”时，汪精卫甚至说：“可由本会要军事委员会出一布告，说明此次湖北总工会解除纠察队的武装，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谋害工会的，定行拿办”。会议决议交军事委员会草拟命令，“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损害该工会者，着地方军警，从严拿办”。^⑪汪、谭的这种态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第四，武汉工人阶级的队伍是很强大的。武汉工人约三十万，工会三百余个。他们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反击夏斗寅叛变，肃清反革命运动中，都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庞大的革命队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指导正确，她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从上述有利条件看，纠察队实现过江的任务决不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当时党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提出将纠察队调过武昌的主张不是没有客观根据的。

其次，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是只交出了一小部分还是交出了大部分？刘文说：“工人纠察队的枪并没有统统交给敌人，只是交了一小部分，即交出约百分之三十，而且大都是坏枪。因为据有的历史著作记载，当时工人纠察队有枪三千多支。（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我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当时纠察队的枪支实际上只有一千多支，并无三千多支。其根据是：

第一，据吴玉章同志回忆：在交枪事件处理完毕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开会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还说：‘只收到一千支坏枪’。意思是说还有更多的好枪藏起来了，还要逼我们交枪。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⑫吴老说：“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这就证明当时工人纠察队只有一千多支枪，并且已全部交出去了。而刘文为了证明当时只交出一小部分枪支，在引用吴老的这段回忆时，却有意识的删去了“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这一句重要的话。

第二，据叶挺同志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所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⑬中记载：“工会纠察队约一千余支枪”。我认为叶挺同志的记载距交枪事件发生的时间不远，应该说是更为可靠的证据。

第三，据项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写的自传中说：“工人纠察队有四千余，一千余支枪”。曾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项英同志的记载，应该说也是更可靠的证据。

第四，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工人纠察队也只是一千多支枪。^⑭张的回忆可作为一个旁证。

第五，从当时工人纠察队发展壮大的过程来看，也证明不可能有三千多支枪。

其一，据孙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召开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报告说：“湖北总工会请准扩充纠察队拨给弹械，并核发宣传费，有一个计划书，预备扩充纠察队至一千五百名，两人共枪一支，需枪七百支，宣传费则要一千二百元”。会议决议“弹械问题交军事委员会”处理。^⑮以后是否实现了这个决议，没有看到文字记载。这是四月下旬的情况。

其二，据蔡和森同志回忆：“夏斗寅之变，我本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二千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现在工农在他们看来如此过火，他们自然怕工农拿着枪便要转来打他们自己呵！’两湖议决案通过之后，湖北省委对于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之事曾有一度计议，但不久，‘进攻’空气消沉，这种计议亦随之消沉。”^⑮可见，五月打夏斗寅时，汪精卫答应拨枪二千支的诺言并未实现，湖北省委扩大工农武装的计划也未执行。蔡和森同志还说：“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说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委执行。”^⑯既然汪精卫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党又是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可以设想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还会继续增加到三千支呢？

上述事实证明，当时纠察队的枪支只有一千多支，同时，这些枪支又几乎全部交出去了。

再次，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是不是大部分转移到叶贺部队中去了？刘文说：“以交出一千来支坏枪，去应付敌人，而把两千多支好枪埋伏起来了”，“那么埋伏下来的两千多支好枪又到那里去了？多种史料证明：这两千多支枪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多次起义所用武器的来源之一。有的被中共湖北省委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秋收起义组织输送到农村，用以开创革命根据地；而更多的工人纠察队员和枪支则按照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的安排，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转移到了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刘文所讲的两千多支好枪的去向问题，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刘文并未列举出具体事例，对于后一种情况，刘文举出了一系列具体事例，来作为他们立论的依据。我想对这些具体事例逐个进行些考察。这种考察看来有些烦琐，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却又非这样做不可。

例一，刘文说：“据杨立三同志回忆，他原在湖南从事农运工作，‘马日事变’以后，他在敌人搜索下不得不转移到武汉。经湖南区委介绍，在武昌找到了党中央军委，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令他随同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的部队工作”。刘文说：在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蒋先云同志参加第二次北伐之后，“陈赓同志继任了他的工作”。刘文引证杨立三同志的回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纠察队负责人陈赓同志和一些纠察队员转移到了叶挺部队。

究竟陈赓同志是否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刘文是以张国焘的回忆为根据的。但是，陈赓同志自己说：“南昌决裂，到武汉，被派至唐生智部下为特务营长。”^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武汉政府时代，我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迁就当时的汪精卫派国民党，自动把武汉市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并且命令我把特务营交给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⑱在这里，他明确讲了在武汉政府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同时，也讲明了他被迫交出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是同时发生的事。这就证明所谓陈赓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事是不可信的。

工人纠察队第一大队副队长杨松青的回忆也可以作为旁证，他说：“纠察总队队长第一任项英，第二任蒋先云，第三任李立三。”^⑲他没有讲陈赓同志担任总队长。

例二，刘文说：“曾任纠察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的杨青松回忆，他带的八百多名纠察队员，在外面隐蔽了几天后，多数都编到了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三师里。”我所见到的杨松青（不是杨青松）回忆的原文是这样：“刘佐龙是反革命的武装，驻在汉阳，六月底七月初，谣传要缴我们的枪，这时我们就离开了新市场，共有八九百人到杨森花园，坚持三天三夜，但他们没有来，后来是总工会的一个人叫我们缴的枪，缴给二十年（贺龙部队）编到第三师去。从此，

纠察队就解散了，后来我到南昌去参加“八一”起义，与我同去的有车夫工人李汉杰，泥水匠工人王(刘)卓臣，铁路工人张作兴三人。”^①由此可见，刘文所引用的和原文是有出入的，编入贺龙部队去的，并不是八百多名纠察队员的多数，而只有杨松青等几个人。至于杨说枪支缴给了二十军编入了第三师的问题，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第一，当时贺龙二十军不驻扎在武汉，而驻扎在广济武穴一带，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怎么可能把那么多枪支运送到广济武穴去呢？第二，据刘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所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中记载，第二十军第三师是起义军打到江西临川时才成立的。^②怎么可能纠察队一解散，枪支就立即编到第三师去了？

查遍已经公开发表的关于南昌起义的回忆录，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革命武装的各个部分，都分别发表过回忆文章，唯独没有发现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员携枪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文章。如果象刘文所设想的有那么多纠察队员和枪支参加南昌起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但为什么连一篇回忆文章都见不到呢？

例三，刘文说：“于兵在《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同志》一文中说：‘党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将一些被反革命追捕的工农武装转移到二十军来，让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也投奔到贺龙同志的部队中，并且把工人纠察队在白色恐怖下藏起来的枪交给了贺龙同志。贺龙同志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编到我这里来’”。但是，于文并未指明交给贺龙同志的枪支就是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所以，引证于文作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转移到贺龙部队的理由也是根据不足的。

例四，刘文说：“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中也说：‘有一天，警卫营的同志奉命到一个地方，一下取回来好几百条枪。这是工人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但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南昌起义》一书原来是有所交代的。该书中说：“从鄂东武穴出发的贺龙同志的部队，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不少农民协会的骨干纷纷自动加入行军行列，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党、团员，政治上很强，有的当了基层干部。有一天，警卫营的同志奉命到一个地方，一下取回来好几百条枪。这是工人同志拒不执行陈独秀的解除武装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在这里，讲清了是在贺龙部队从鄂东武穴出发以后发生的事，而不是在汉口发生的事，所以，不能肯定这就是武汉工人纠察队隐藏下来的枪支。但是，刘文为了证明这些枪支是武汉工人纠察队保存下来的，在引证时，删去了“从鄂东武穴出发的贺龙同志的部队”这样一个地点前提。

此外，我看到刘长年同志在《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深切怀念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贺龙同志》一文^③，也讲了取枪支一事是在贺部从武穴开往九江途中发生的。

例五，刘文还写道：“当时北京《晨报》曾报导说，贺龙等部在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中，‘其大部分，在河南受大创，目下以农工纠察队及学生补充训练中’”。但是，《晨报》也并未指明这些“农工纠察队”就是武汉工人纠察队。

一部分工农武装输送到了贺龙部队，贺龙同志因看到共产党给他补充力量而十分高兴，这样的事实的确是有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工农武装是否就是武汉工人纠察队呢？

叶挺同志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中讲：“此时我们及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命令向南昌一带集中，我们中央在此发表反对分共的主张，并仍企图让步，挽救时局的危机，如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令鄂城、大冶各处武装工农编入贺龙的军队内”。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输送到贺龙部队去的并非武汉工人纠察队，而是鄂城、大冶等

处的武装工农。

贺龙同志自己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回忆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的。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②他本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回忆证明，转移到他的部队去的是各地农民协会委员长，而不是武汉工人纠察队长。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大部分枪支转移到叶贺部队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当然，我并不否认有少数纠察队员或枪支转移到叶贺部队中去的可能性，但是应该肯定，这种转移并非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实际上，纠察队交枪时的情况是混乱的。据蔡和森同志回忆：“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由此也说明，交枪并非周恩来同志具体执行的——引者注）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③李立三同志也回忆说：“因此党更加动摇起来，决定自动解散纠察队，中央决定这一命令后，就马上搬到武昌了，总工会同志接到这一命令，没有办法，忠发同志就来找中央，但中央已经搬了，结果队长慌慌张张地叫纠察队回家，纠察队就一跑四散，流氓马上到总工会来抢东西，接着军队也马上占领工会，工会就变成空机关。”^④当时中央农讲所的涂国林的回忆也可以作为蔡、李回忆的旁证。他说：“几天前，我曾到汉口‘血花世界’（当时汉口有名的游艺场）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找个朋友，看见队员们都是雄赳赳的；但过了两天再去时，他们一个个变成垂头丧气，手中武器也没有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哪个晓得？奉命缴械了！’”^⑤在这样手忙脚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把两千多支好枪埋伏起来”呢？怎么可能“让纠察队员三三两两过江，‘实际编入张军’”呢？

综上所述，可见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的最后的实际结果是：纠察队是公开宣布解散了，而纠察队却没有编入叶贺部队，甚至把枪支几乎全部交给了敌人，这就是交枪事件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自动缴械”，还不是“投降式的让步”吗？还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吗？还能算是“必要的妥协”吗？〔注〕

二

要正确判断交枪事件的性质，不仅要弄清交枪的真实情况，而且要把它和当时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刘文批评有些人不善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当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时，中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错误的。”一般的说，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交枪事件是否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无关呢？我认为，它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典型表现之一，正如“八七”会议所指出的，它是“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的政策之一部份。”^⑥

众所周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一向忽视和反对建立我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的。大革命进入紧急阶段后，陈独秀对待建立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错误态度愈来愈严重。据吴玉章同志回忆：“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闿的说话，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

〔注〕我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上《武汉工人纠察队》（史话）一文，由于没有进行认真的考证，人云亦云，也说纠察队有“三千支枪”，“许多拒绝交枪的纠察队员，加入了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②六月十五日，党中央通过的陈独秀提出的关于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问题给共产国际的复电中，认为组织以工农为主体的新军队条件还不具备，复电写道：“我们认为，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同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吸引这些左派领袖，找出一个共同的政纲。假如同他们分裂，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军队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复电还说：“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③但是，实际情况并非象陈独秀所说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搞十万二十万人都可以的。”^④“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⑤以上事实说明，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条错误路线最重要的内容，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⑥“我认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有了武装，就会有办法组织一切。”^⑦“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没有注意抓枪杆子。我们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还不懂得主要在武装斗争上争夺领导权。……二七年上半年不仅不抓武装，还自动放弃武装，解散纠察队，当然，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央的认识水平。”^⑧（附带提一下，刘文说“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军委向‘六大’所作的军事报告，没有提交枪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以上叙述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错误，并非与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无关的，因为交枪事件的发生，是和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错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他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典型表现之一。事后陈独秀在谈到交枪问题时，虽然把责任完全推给党中央，但也承认是“莫大的错误。”^⑨

同时，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也是和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处处迁就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是服务于要维持所谓“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总政策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他（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⑩瞿秋白同志也指出：“六月二十七日中央开会，决定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纲，当晚便自动执行解散武汉的工人纠察队。”^⑪瞿秋白同志的回忆，虽在具体时间问题上与事实有出入，但交枪事件的确是在已经形成的“十一条政纲”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三十日通过的“十一条决议”也证实了这一点，决议重申：“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⑫

我们还看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正是适合了一些反动军官的反革命需要的。如何对待革命武装的问题，是大革命进入紧急阶段后，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一个焦点。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许克祥和何键，都把革命武装看成是他们实行反革命政变的主要障碍，他们都懂得要实现公开叛变革命的阴谋，首先必须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首先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开刀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时，也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工人武装的。反动军官何键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最凶恶的敌人。早在四月底，何键就曾在汉口召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的军事政变的计划，由于他们害怕驻扎武昌的叶挺廿四师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力量，不敢选择武汉作为首先发动军事

政变的地点。⑳到六月底，他们以为反革命政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就向武汉工人纠察队开刀了。“何键等公开要求 CP 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㉑这就说明反动军官何键完全继承蒋介石、许克祥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法，把消灭工人革命武装作为他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六月二十八日宣布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把枪支交给国民党，正是迎合了何键等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需要的。这种投降式的让步，是否获得了反动派的妥协呢？事实恰恰相反，当解散纠察队之后，反动军队和地痞流氓猖狂地占领和捣毁工会机关。“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除此之外，已经有两三处工会被捣毁了”，“军队跑到全国总工会去，贴上一些某某办事处的条子，把房间都占住了。”㉒“据各方报告，近一二日以来外间竟有流氓地痞，勾结匪徒，捣毁工会，抢劫财物情事。”㉓“反动派多散流言，甚至唆使流氓地痞，捣毁工会，殴辱工会负责人员，如理发工会之被毁，此其例也。”㉔燃料业总工会煤业第一分会，武汉车工总工会马车分会也被捣毁。㉕敌人造谣说：“总工会自行解散纠察队后，各工会不日即取消。”㉖这些事实说明，纠察队“自动缴械”的做法，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严重损害了轰轰烈烈的武汉工人运动。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㉗让步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让步，是可以允许的，一种是消极的让步，是应该反对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不能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让步，而是一种消极的让步，即投降式的让步。这是历史早已作过的正确结论，我们不应该毫无根据地否认这一正确的结论。

(本文写作于 1981 年 1 月，修改于同年 10 月)

注释：

- ① 《中国问题指南》第二册，1937 年出版。
- ②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1 页。
- ④ 《历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
- ④⑦⑮⑱⑳㉑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载人民出版社《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 ⑤⑬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 ⑥⑫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载《党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
- ⑧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⑨ 朱道南：《在大革命洪流中》，左洪涛：《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
- ⑩⑭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 ⑪⑳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吴玉章回忆录》。
- ⑱ 《我的自传》，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2 期。
- ⑲ 《从南昌到汕头》，载人民出版社《南昌起义资料》。
- ⑳㉑ 此回忆材料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

究室。

- ㉒ 载《党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
- ㉓ 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贺龙》。
- ㉔ 载重庆《新华日报》1951 年 8 月 7 日。
- ㉕ 《关于党史报告》（1930 年 2 月）。
- ㉖ 《难忘的日子》，载人民出版社《南昌起义资料》。
- ㉗⑳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 ㉘ 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7 期。
- ㉙⑳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载《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 ㉚⑳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01 页、第 2 卷第 503 页。
- ㉛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的军事报告。
- ㉜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 年 12 月 15 日）。
- ㉝ 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38—139 页。
- ㉞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 4 月）。
- ㉟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
- ㊱⑳⑳⑳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6 月 30 日，7 月 2 日，7 月 2、4 日，7 月 2 日。